

简明西方思想史

JIANMING
XIFANG
SIXIANGSHI

主 编 解晓东
副主编 刘 洋
金 毅
朱彩霞



高等教育出版社
HIGHER EDUCATION PRESS

简明西方思想史

Jianming Xifang Sixiangshi

主 编 解晓东

副主编 刘 洋 金 毅 朱彩霞

参 编 (以姓氏汉语拼音为序)

董 冰 郭 颖 马艳朝

弭 维 任 堃 张振鹏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HIGHER EDUCATION PRESS BEIJING

内容简介

本书在时间选择上,跨越了近 2 500 年,从古希腊时期直至后工业时期;在人物选择上,选取了从苏格拉底到福柯共 17 位具有代表性的西方思想家。全书分为导言、西方思想的源头、中世纪西方思想与基督教、西方近代思想与理性主义、西方现代思想与现代性的展开、西方当代思想的分歧与争议 6 个部分。编写者力求摆脱思想史著作常见的表达方式,尝试使用简明、通俗的语言,以增强全书的可读性。

本书适合作为高等院校的通识课教材,也适合对西方人文思想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简明西方思想史 / 解晓东主编.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10

ISBN 978-7-04-038497-0

I. ①简… II. ①解… III. ①思想史-西方国家-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B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22431 号

策划编辑 吴 勇 易斯翔 责任编辑 易斯翔 封面设计 姜 磊 版式设计 王 莹
责任校对 刘娟娟 责任印制 毛斯璐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邮政编码	100120		http://www.hep.com.cn
印 刷	国防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radio.com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http://www.landradio.com.cn
印 张	10.5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字 数	250 千字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定 价	35.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 料 号 38497-00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西方思想的源头	(5)
第一节 苏格拉底:西方爱智传统的肇始	(5)
第二节 柏拉图与《理想国》	(15)
第三节 亚里士多德:“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23)
第二章 中世纪西方思想与基督教	(33)
第一节 奥古斯丁: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	(33)
第二节 阿奎那:天使博士	(40)
第三章 西方近代思想与理性主义	(49)
第一节 笛卡尔:“我思故我在”	(49)
第二节 洛克:自由主义的起源	(57)
第三节 卢梭:为平等而呐喊	(66)
第四节 斯密:“看不见的手”	(75)
第五节 黑格尔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84)
第四章 西方现代思想与现代性的展开	(93)
第一节 马克思:资本主义的批判者	(93)
第二节 韦伯:祛魅世界的思想家	(103)
第三节 弗洛伊德:人的自我发现	(112)
第四节 尼采与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终结	(120)
第五章 西方当代思想的分歧与争议	(129)
第一节 凯恩斯:现代经济思想的分水岭	(129)
第二节 哈耶克:20世纪的辉格党人	(138)
第三节 福柯:现代过后是何方?	(149)
后记	(158)
参考文献	(159)

导 言

正如 H.G. 韦尔斯所说：“全部人类历史从根本上说是思想的历史。”当今的中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了解西方的思想。现代文明的核心是工业文明，而工业文明恰恰源自西方，西方的工业文明从根本上又是西方的思想与观念价值的产物。毫无疑问，“西方思想史”是个迷人和富有挑战性的学习研究课题。迷人源于人类求知、爱智之本能，挑战则是一方面，西方学界关于西方思想史研究之累累成果；另一方面，国内学界研究成果之匮乏。随着诸多翻译作品的问世，编写一部适合大学生和对西方思想史有兴趣学习者的简明教材，则显得尤为迫切。

长期以来，受极左思想以及庸俗唯物主义价值观的影响，我们一直把古代大部分西方思想家的思想贬斥为“唯心主义”，把近代以来的西方思想作为“资产阶级”思想予以“一棍子打死”式的批判。这既不符合历史实际，也不利于我们建设现代文明富强国家的目标。“西方中心论”当然与世界文明的进程不符，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代的人类文明史，毫无疑问是西方思想在唱主角，即便是马克思主义也源自西方。可以说，近代以来，西方思想引导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进而改变了整个世界。

在 2000 多年前的古希腊，一些人或是不满意于世界的纷繁变幻，或者有感于时代的危机四伏，他们试图通过自己的思想来对世界和时代进行把握。这些人中的一部分，我们后来称之为思想家，而这种现象本身构成西方思想的源头。应该说，这种思考本身而言，在人类历史上并不孤立，大致在同一时间，中国的老子、孔子，印度的佛陀也开始对上述问题进行这样或者那样的思考与追问。用今天的眼光看来，尽管古希腊思想涉及很多人类探求的共同主题，但是，就他们所凭借的思维方式和思考素材来说，我们能够发现这种思想本身具有很强的地域性色彩。这种发端于古希腊的西方思想，在后来的岁月里几经承继与嬗变，在近代以来，其性质与影响竟发生了戏剧性转变。与西方物质文明在世界范围内强势崛起一道，西方思想也挣脱地域限制的藩篱，一跃而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现象。随着西方主导和推动下的现代化进程的一波波展开，后发展国家和地区都不得不面对如何看待西方思想的问题。古老的中华文明在被迫与西方文明进行全方位接触后，迅速地以极大的热情展开对西方思想的关注，从而揭开在西方思想参照下的、中国现代思想构建的曲折历程。在近代中国，乃至所有后发展国家和地区，人们可以崇拜、迷恋西方思想；摒弃、痛斥西方思想，抑或是更为审慎地吸收、借鉴西方思想，但就是不能无视和回避西方思想。

西方思想缘何具有如此魔力？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应该是见仁见智的。但是，西方思想的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思想的影响力又当如何理解呢？这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从抽象意义上来说，人们很容易赞同思想对于人类行为，乃至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然而，在具体问题上人们对思想究竟具有何种意义的认识就不是如此直截了当了。这也难怪，历史上，思想与强权碰撞，往往是以思想的一时失败而告终。正如撰写《理想国》的柏拉图，只能在现实政局面前颠沛流离，亚里士多德的谆谆教诲，也没能阻挡他的弟子亚历山大终结城邦时代。批判的武器终究没有武器的批判来得直接，“秀才”在士兵面前似乎永远是一个弱者的形

象。然而,问题远没有如此简单!追缉柏拉图的僭主早已在历史的长河中灰飞烟灭,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而今只能让人怀古唏嘘,然而,整个西方哲学史却被有的人视为柏拉图思想的注脚,人们在对人与社会等方面的思考动辄需要回到亚里士多德这位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的身边。在此,强权早已腐朽,而思想者的光辉永存。不仅如此,近代以来,西方世界进入一个快速变更的转型时代。此其中,思想对世界的改变更为直接,也更为显著。洛克式自由主义影响和塑造了英、美两国在近代的政治走向;卢梭对平等的热情呼唤,在整个法国大革命中得到持续不断的回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痛诉与对共产主义的渴望,激发了多少代人为之奋斗与牺牲;凯恩斯与哈耶克的争论背后,是福利国家的兴衰与沉浮。可以说,西方思想是西方历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西方文明之内在编码。只有在西方思想的背景之下,人们才能对西方所走过的道路进行某种理解和解读,不了解西方思想,就很难真正了解西方的现代化历程;不了解西方思想,同样也难以真正认识后进国家的现代化道路。

西方思想发源、发展于西方世界,并对西方世界的历史进程产生深远影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西方思想的影响仅仅局限于西方。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展开,文明之间的影响日益显著,西方思想的影响力明显具有外溢效应。概而言之,就近现代而言,西方思想通过对西方世界这一典型的塑造和把握,实际上展开了对现代化由来以及随之而来的现代性问题的集中思考,从而具有世界意义。洛克、卢梭、马克思等等西方思想家的名字早已为许多非西方世界的人们所熟知,并在他们思想的指引下进行着自身的现代化历程。不仅如此,一些与“改造”世界联系不那么紧密,而是更为着眼于“解释”世界的西方思想家们则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知识资源和思想财富。尽管誉议颇多,笛卡尔的思想依然被视为现代性精神的最佳代表之一;亚当·斯密的学术思想至今仍然是人们理解和捍卫市场经济的雄辩之说;韦伯学说为我们理解身处其中的现代社会提供了绝佳的思想路径;黑格尔用拗口、但却严密的逻辑向人们展示了辩证法的魅力;弗洛伊德的研究让人们认识到了自我所具有的另外一面;尼采以其重估一切的怀疑主义锋芒,为我们开启了现代性的不同视域;福柯思想中的解构特征与后现代主义的浪漫激情,在某种程度上展示了西方思想在现代发展的某种探索,尽管这种取向并非没有争议。上述思想家所思考的问题,尽管针对西方,然而其影响却远远超出西方范畴,成为人们在现代化进程中思考自我与社会的共同基础。

面对人类历史上的伟大智者,我们必须采取一种谦恭与近乎惶恐的态度。就像美国学者布鲁姆在其《巨人与侏儒》的导言所说:“‘我们都是矮子,但是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谦卑的姿态,表达了太多的自我满足。巨人是那么容易让我们爬上去的吗?巨人的功能就是把侏儒扛上他们的肩膀吗?或许他们曾经是亲切和蔼的,但是现在他们却把我们摔在地下,偷偷地走了,只留给我们一个视界更宽一些的幻觉。毫无理由地假设我们和伟大者的亲密关系,很快就会使年轻人否定有什么巨人,并断定这整个说法不过是一个谎言,是由教师们编造出来抬高自己的。我想,巨人会鄙视这小小的喜剧和玩笑。”^{[1]3,4}西方思想在时间上跨越几千年,在空间上覆盖不同的国家与地区,在内容上更是色彩斑斓,在观点上未尝没有抵牾与争鸣。西方思想内在的复杂与斑驳,使得任何试图对其进行全景式概括或者介绍的努力,都可能是一种“自找麻烦”的尝试。然而,这种尝试却是十分必要的。这种必要性对于试图认识西方的“他者”而言尤其显得急迫。

[1] 布鲁姆:《巨人与侏儒——布鲁姆文集》[M].张辉,选编.秦露,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作为一种尝试,本教材试图透过西方思想表层的纷乱与流离,探寻出其中的经纬,并以重点人物为纽带,勾勒出一幅尽管粗略,但却相对清晰的西方思想面貌,希望能对西方思想的研究学习有所裨益。

本教材由如下结构和内容构成:

第一部分,古希腊独特的风土人情孕育了西方思想的源头。这一时期,人们开始仰望天空,俯查大地,寄望以此揭示宇宙、社会与人生的奥秘与真谛。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对自然的考量转向对人自身的关注,从而开启西方思想史上的理性主义传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苏格拉底的嫡传与再传弟子,他们的思想既有传承也有分歧,然而,后世人们的诸多思想都可以在他们身上找到萌芽或影子。

第二部分,基督教的兴起,对于西方文明的进程而言,具有革命性影响。基督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古希腊人文精神的同时,却也通过神学引入,为西方文明注入了新的基因。基督教所宣扬的普世神学,使得人们能够摆脱继往对狭小地域的过分关注,进而形成对人类的整体的一般关怀。在上帝与人、此岸与彼岸、灵魂与肉体、天堂与尘世之间的复杂关系中,奥古斯都、阿奎那开始对什么是正义、什么是真理等问题进行探究。这一时期,西方思想事实上并没有完全偏离古希腊所开创的理性传统,只不过,神的理性代替人的理性成为人们思考的核心。

第三部分,尽管认为中世纪一团漆黑,暗淡无光,在今天看来是启蒙时代世人所持有的偏见。然而,中世纪后期,神权盛行对思想发展造成某种桎梏与限制也是现实。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后,人文主义精神在西方世界日渐复苏。人们又开始运用人的视角和眼光来审视和打量这个世界。与之对应的,人的理性观念逐渐摆脱中世纪神学的约束,更为积极地对外在于人的世界发挥影响。这一时期,人的主体性和人的理性能力得到张扬,笛卡尔所宣扬的“我思故我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此间,理性成为人们思考世界、改造世界的依据和标准。此时期可以称之为理性主义时代。

第四部分,从公元1800年开始的人类历史,既是一个现代性展开的过程,也是一个人们试图理解,乃至批判现代性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理解与批判是上一阶段理性主义力量的进一步发挥。理性不满于摆脱神学,而是进一步试图解释、改造这个世界。理性或是被誉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或是被视作拯救现代性罪恶的诺亚方舟。与此同时,理性的不足与缺憾开始被人们所发掘,理性主义传统受到动摇。

第五部分,20世纪是一个人类取得辉煌成就的世纪,与此同时,20世纪也是一个人类饱尝艰辛与苦难的世纪。现实的冲突与矛盾,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迫使人们思考近代以来的思想是否出现了什么问题,西方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理性主义首当其冲,受到更为猛烈的冲击与挑战。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可以被视为一种较为激烈的思想反抗。然而,这种反抗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思想革命之后又该如何?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当下仍在进行之中。

一位英国诗人曾经说过:“人是一个世界,也有自身的造物,人的自身造物是人的思想,思想生来就了不起”^{[1]序}。因此,思想史从来不是过去思想的坟墓,而是人的尊严的凝结。对于我们所有的受教育者或学习者而言,恰如布鲁姆在《纪念施特劳斯》所言:施特劳斯认为,“柏拉图式的洞穴图景描述了人类的根本处境。人是其所处时代及场所中权威意见的囚徒,一切

[1] 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人由此开始,大多数人也在此结束。教育就是从这种束缚中获得解放,就是上升到某种立场,从那里能够看到洞穴。”^{[1]5} 人类创造了思想,思想又反过来改变人类,进而改变世界,这正是人类的特殊存在方式。人与思想的互动及其产生的影响,正是生存在这个星球上的人类伟大与光荣的证明。

[1] 布鲁姆.巨人与侏儒——布鲁姆文集[M].张辉,选编.秦露,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第一章

西方思想的源头

第一节 苏格拉底：西方爱智传统的肇始

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与其弟子柏拉图及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被后世并称“希腊三贤”,雅斯贝尔斯更将其与孔子、耶稣、释迦牟尼并称“四大圣人”。苏格拉底是西方思想史上的里程碑式的人物,其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苏格拉底出生于雅典的爱罗匹格区一个普通家庭,父亲从事雕刻,母亲专职接生。他生逢雅典鼎盛时期,自幼深受雅典浓郁文化氛围浸染,修习过音乐、几何、数学与天文,打下了良好的知识基础。青年时期的苏格拉底有幸接触到当时享有盛名的雅典哲学家,并开始在哲学上崭露头角。从这一时期开始,苏格拉底便立志以探寻美德与知识为己任。他常常与年轻人针砭时弊,以“助产之术”帮助人们得到心中的知识。相传,苏格拉底曾被神谕奉为雅典最有智慧的人。在神谕的召唤下,苏格拉底更是倾尽其能地履行自己的“牛虻”使命,为当时的雅典忧心尽责。但此时的雅典历经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创伤,渐显衰落之势。苏格拉底参加过其中三次战争,且在战争中展现了果敢从容的豪气。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倾心竭力爱民护国的雅典公民,最终换来的却是一纸罪状。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以渎神罪、蛊惑青年罪被判处死刑,年已古稀的苏格拉底最终以这样一种悲剧式的结局穿透了古今,将智慧之光照耀世人。

■ 经典语录

神特意把我指派给这座城市。它就好像是一匹良种马,由于身形巨大而动作迟缓,需要某些牛虻的刺激来使它活跃起来。在我看来,神把我指派给这座城市,就是让我起一只牛虻的作用,我每天飞来飞去,到处叮人,唤醒、劝导、指责你们中的每一个人。

——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一卷)《申辩篇》

死亡降临一个人的时候,死去的是他的可朽部分,而他的不朽部分在死亡逼近的时候不受到伤害地逃避了,他的不朽部分是不可灭的。

——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一卷)《斐多篇》

一、苏格拉底问题

翻开古希腊的哲学史巨著,会有这样一个名字跃然眼前,希腊哲学史以他之名被界定出明晰的阶段划分,他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苏格拉底。他是古希腊史上一位划时代的人物,在他之前的哲学史阶段被称作“前苏格拉底时期”。他实现了希腊哲学的某种转型,从而开创了辉煌的“苏格拉底时期”,并促进着“后苏格拉底时期”的兴盛。在人们心中他是智慧之化身,美德之使徒,引导着人们虔诚地热爱智慧、追寻美德。

这样一位声名显赫的大家,却没有为我们留下一本以“苏格拉底”为作者的著作。没有任何

著述留世的苏格拉底又何以能够成为人们口中称颂的开创性思想家?何以能够在西方思想史中掌舵领航呢?这些正是困扰世人的“苏格拉底问题”。

目前学界对于研究苏格拉底史料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与苏格拉底同期的古希腊戏剧家阿里斯托芬、其弟子色诺芬和柏拉图的作品中,同时还有较晚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相近时代的人物所记载的历史可信度是比较高的,这是学界学者所达成的共识。但在这些史料中所呈现的苏格拉底并非是一个完整清晰的形象,而是包含了诸多的矛盾对立之处,这才是苏格拉底之所以神秘的真正原因。

阿里斯托芬是古希腊鼎盛时期一位小有名气的喜剧家,他创作的喜剧《云》有幸得以流传后世,这部剧作以苏格拉底作为主角。在剧中,阿里斯托芬将玩弄诡辩的智者、有无神论倾向的自然哲学家和禁欲主义的道德家这三种形象都捏合在苏格拉底身上,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1] 464}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狂傲诡辩的苏格拉底。有的学者认为此剧是对日常生活中的苏格拉底的真实再现,于是以此来断定苏格拉底的人物形象。但学界普遍认为,喜剧中的苏格拉底仅是一个虚构的角色而已,只是以一个众人熟悉的人物来达到喜剧的效果,据说在观看喜剧现场苏格拉底还在台下起立亮相。而且我们可以在柏拉图的《会饮篇》中发现,苏格拉底对阿里斯多芬的态度是友好且加以赞扬的。学者们认为戏剧中的苏格拉底即便真实,那也只是学术思想成熟之前的青年苏格拉底而已。

色诺芬师从苏格拉底,但是他并未以哲学为业,而是一位以从商为业的历史学家。^{[2] 12}对恩师苏格拉底的记述主要体现在他的《回忆录》中,此外还有《会饮篇》、《申辩篇》等几篇印证柏拉图对话篇的记述。学界很多学者对色诺芬著作的评价较低,认为他的记述文采暗淡,缺乏思想境界,没有可利用的价值。但也有学者认为应公正地看待色诺芬的著作,他的《回忆录》记述了苏格拉底谈论哲学、政治、军事、经济、教育、审美、技术乃至养生等问题,其中不少内容是柏拉图对话篇中所没有的。^{[1] 465}因此色诺芬所提供的史料,是具有真实性的颇有价值的历史根据。

柏拉图是苏格拉底弟子中最具才华的一位,也是古希腊思想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大家之一。我们了解苏格拉底思想最主要的史料依据,便是柏拉图的《对话篇》。柏拉图创作了数量丰厚的哲理篇章,这些蕴藏深邃的思想对话大都以苏格拉底为主角,因此在柏拉图的笔下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睿智不凡的苏格拉底。但柏拉图笔下的深邃哲理全然是对苏格拉底思想的追忆呢,还是仅仅是借苏格拉底之口表达自己的思想?这个疑问则是解决“苏格拉底问题”的难中之难。目前来讲,学者们根据对柏拉图《对话篇》特点的细致研究,而将这些《对话篇》划分为早、中、晚三期。其中早期与部分中期的《对话篇》,诸如《申辩篇》、《克里托篇》、《拉凯斯篇》、《欧绪弗洛篇》、《普罗泰戈拉斯篇》、《高尔吉亚篇》,则成为我们研究苏格拉底的重要史料依据,而且学者们大多认同苏格拉底学说领域主要是伦理学,而柏拉图学说涉及的范围则更为广泛。

亚里士多德作为柏拉图的学生,其对苏格拉底的思想也是有一定传承的。他对于苏格拉底的记载内容不多,因为生活于晚于苏格拉底的时代,他对于苏格拉底的了解也只是通过他人叙说。他的著作中主要是对其师柏拉图的思想与苏格拉底的思想进行比较时所作的一些评论。亚

[1] 姚介厚.西方哲学史(学术版·第二卷)[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2] 霍普·梅.苏格拉底[M].翟旭彤,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

里士多德提出“苏格拉底不研究物理世界,而研究伦理世界,在这个领域里寻求普遍性,第一个提出了定义的问题”,这一定论得到学界普遍认可。此定论被作为划分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重要依据,因此对于我们认识苏格拉底也是极具借鉴价值的。

二、理性主义哲学的开创

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苏格拉底所处的雅典城邦衰落了。此时的雅典辉煌不再,到处充斥着政治势力派别间的混乱争斗。不仅如此,公民精神和道德世界也出现危机。眼前的一切让苏格拉底灼心,他热爱自己的城邦与公民,容不得城邦的危机与堕落。在这种背景之下,苏格拉底肩负起了“牛虻”的使命,倡导哲学救世,启迪人们追寻智慧与美德。苏格拉底哲学救世之理想在践行过程中孕育着古希腊哲学的繁盛,他为后世开创了理性主义哲学之道路,并将哲学的关怀从天上拉回人间。

1. 苏格拉底与哲学变革

苏格拉底最初钻研的是当时全希腊盛行的自然哲学,这种哲学试图探究宇宙的本原。但在对当时一些极负盛名的自然哲学家的著作进行了解之后,苏格拉底大失所望,因为他认为这些作者都没能对他心中的疑惑进行真正的解答。这就促使苏格拉底自己尝试着将关注的焦点从浩瀚的宇宙转向人自身、转向城邦之中,并以此探寻他心中关于善的问题。唯其如此,古罗马自然哲学家西塞罗称颂道:“前苏格拉底哲学关注数字和运动,探究事物来自何处、去向何方,而苏格拉底是第一个将哲学从天国唤到尘世之人,他甚至把哲学引入寻常人家,迫使哲学追问生命与风俗习惯,追问好与坏。”^[1]⁷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通常认为是苏格拉底实现了哲学从天上到人间的转换。

与苏格拉底同时的智者学派的学说在雅典也是极其风行的。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智者学派也将关注的目光投放在人的身上,而且就出现时间而言,似乎比苏格拉底更早。但纵观智者学派的主张,他们的观点逐渐偏离了古希腊,尤其是古雅典的道德标准。这一哲学派别所标榜的相对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当时社会道德与价值危机的呈现。因此,苏格拉底很自然地将智者学派当作了论敌,他对智者学派的学说进行了深刻批判。他试图以一种理性主义的哲学匡正智者学说中的感觉相对主义,以普遍性的真理驳斥智者们混乱相对的道德价值,以理性求得知识的价值意义代替智者修辞术这一工具的意义。可以说,苏格拉底的思想主张很多就是以智者思想为靶子而提出来的。

苏格拉底对早期自然哲学家以及智者学派的思想进行批判与反思之后,将希腊的哲学焦点转向人们自身,喊出“认识你自己”的哲学口号。“认识你自己”是当时刻在雅典德尔菲神庙墙上的一句铭文,与此对应的另一句铭文是“要自制”,这两句话实为融会贯通之一意。在古希腊,“自制”包含三重意义:一是指理智健全、明智稳健,与理智失衡、愚妄偏见、无自知之明相反;二是指人道,即仁慈、谦和;三是指对欲望的自我约束与控制,即节制。^[2]⁴⁷⁴苏格拉底将“自制”的第一条要义“自知”作为探索人之哲学的立足点,即提出人应该有自知之明,学会适度勿过。他进而认为人应该谦逊温和,承认自己之无知。苏格拉底曾坦诚“我唯一知道的就是自己的无

[1] 叶秀山.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2] 姚介厚.西方哲学史(学术版·第二卷)[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知”。同时,苏格拉底倡助人应该懂得节制,以人的理智精神与美德力量来克制欲望、情感上的无度追求。更深层次上来讲,苏格拉底警醒雅典公民要认识到个体之限度,将自己这一个个体放置在恰当的位置,各得其所,各司其职。他希望借此实现个体与城邦整体之和谐一致,而这便是“自制”。只有先“认识你自己”才能够做到这种自制,才能实现“有度”而“勿过”。由此,“认识你自己”便成为苏格拉底探究人之哲学的“纲领性宣言”^{[1]476}。

一般而言,每一个“认识”活动本身都需要有特定的认识对象,由此才会得出相关的知识。比如医学的对象是健康和疾病,音乐的对象是乐器和乐谱,那么“认识你自己”的对象则是人本身。在苏格拉底看来,这就是要认识到人自身所拥有的知识是什么,自己所没有的知识是什么,明确自己的知与无知。而认识的作用在于依靠认识的知识来指导所要进行的事务与活动,正如认识了医学就要用它的知识来祛除病患。那么认识到人自身的知识应发挥什么作用呢?苏格拉底认为,一方面是在生活中能够以“知”指导自己和别人的活动,以“无知”来回避自己所不擅长的事务与活动。而更重要的一方面则是让人自身对自己的知识能力有自知之明,获得一种“知识的知识”。这就是说在具体性的、特殊性的知识之外,人们还可以知道“知识”本身,对知识进行本体论探讨。苏格拉底认为“知识”作为一种普遍性的概念,不仅包含具体的诸如医学、音乐等个别的技艺性知识,同时存在一般的引导性知识。一般的知识教人自知与克制,同时引导人们分辨善与恶。苏格拉底一生以“认识你自己”为座右铭,他不仅自身践行、克己谦卑,同时还引导城邦公民认识自己之“无知”。有记载称,德尔菲神庙曾有神谕称苏格拉底是最有智慧的人,这一神谕给苏格拉底带来了至深的影响。他自觉自己无知,但是神却赞扬他最智慧。怀着对神的虔敬苏格拉底开始探求神谕的奥秘,他四处走访那些自认为很有智慧的人,与他们交谈之后才发觉所谓的有智慧的人其实很是无知。于是苏格拉底彻悟了这则神谕,原来神之所以认为他自己是最有智慧的人,是因为他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承认自己的无知,而且不断去寻求真知。

“认识你自己”实现了苏格拉底对古希腊哲学的方向转引,它指引着苏格拉底展开对理性知识的探寻,尝试着认识事物的普遍性本质,并且在这种理性主义的认识基础上发现美德,寻求至真至美之善。

2. 苏格拉底的哲学观念

苏格拉底在“认识你自己”的宣言指引下,展开对理性知识的探寻。然而只有认识了事物“是什么”,即认识事物的定义与概念,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对事物明确的理解与掌握。苏格拉底与人们对话过程中更多的是追问某一事物的概念,如“什么是节制”、“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勇敢”、“什么是友谊”、“什么是德性”、“什么是善”等等,这便是苏格拉底所提出的普遍性定义之形式“X是什么”。

普遍性定义是指概念的定义有普遍性、确定性和规范性,^{[1]482}这是苏格拉底对事物进行定义的原则。这意味着:首先,苏格拉底试图寻求事物概念中一般的而非特殊的特点。这即是说,要从诸多反映概念的个别特点中归纳出它们的共性,将这一共性的东西作为事物定义之核心。在《对话篇》的《拉凯斯篇》中苏格拉底与拉凯斯和尼西亚等人给“什么是勇敢”下定义,拉凯斯认为“勇敢就是坚守阵地,反击敌人”。他以一个个别的活动特点来回应“勇敢”的概念,然而这仅是“勇敢”概念中的一个特殊的表现,并不能说明普遍意义上的勇敢。随后拉凯斯重新做出定

[1] 姚介厚.西方哲学史(学术版·第二卷)[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义,他认为“勇敢就是灵魂的坚忍性”,对于这样一个定义苏格拉底同样予以否定,认为此定义过于宽泛。^{[1] 182-192}而这一点正是苏格拉底在普遍性定义中所强调的第二个原则:确定性。一个事物的概念不仅需要包含这个事物的普遍性,还必须能够体现这个事物的特性。对这一事物的定义需要有明确的内涵与外延以将其区别于其他类似事物。确定性同样还表明事物的概念是稳定绝对的,而非随着感性的认识与外在现象的变化而变化的。苏格拉底正是以一种普遍的、确定性的概念来批判赫拉克利特所主张的“万物永远处于不断变化流动之状态”的学说,同样也驳斥了当时智者学派依据感觉相对性而解释的事物概念的做法。苏格拉底相信存在永恒不变的知识,人们依靠理性思考是可以掌握这些知识的。此外,普遍性定义的得出还需遵循一定的规范。这种规范就是通过归纳推理的方法对事物的本质属性进行演绎,以固定相应的名称进行概念的“命名”,如此原则之下得出一个理性的普遍性定义。苏格拉底认为只有在普遍性定义的基础之上,才能够真正地“认识你自己”并得到理性知识。这种理性的知识正是苏格拉底所倡导的美德,由此彰显出普遍性定义在苏格拉底哲学思想中的重要性。

我们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能够发现他对普遍性定义之科学价值的赞誉,他提出:“苏格拉底专注于研究美德,与此相联地成为第一个提出普遍性定义的人”,并认为“有两件事可以公正地归功于苏格拉底,即归纳的论证和普遍性定义,这两者都是知识的出发点。”^{[2] 403}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我们同样可以了解到苏格拉底的普遍性定义推进了柏拉图“理念论”的发展,成为柏拉图学说发展的思想渊源与理论雏形,但是苏格拉底并未将普遍的东西或定义从特殊中分离出来,而这正是柏拉图所完成的创举。

苏格拉底得出普遍性定义所使用的方法是“辩证法”。“辩证法”在希腊文中的意思是“通过说话、谈话”。苏格拉底正是以此为哲学方法,在雅典城内的广场街头与不同的人进行对话与交谈。他首先以一种谦卑的态度请教对方所自以为擅长的知识,然后通过提问的方式指出对方回答中的矛盾。通过这种方法让对方对自己的知识进行反思与修正,从而指引对方逐步地接近真正的知识与真理。

辩证法在古希腊并非由苏格拉底首次提出与使用。最早反映出辩证法思想的是早期自然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真正将辩证法诉诸理性逻辑方法的则是爱利亚派的哲学家芝诺。他将思想过程中的有限和无限、运动和静止等矛盾现象进行理性的逻辑思考。但是他的辩证法止于提出问题,而没有对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的见解。随后将辩证法的运用推崇至高峰的是智者学派,他们以辩证的观点将任何问题分解为正反两面,但是正反两面问题并没有真假、对错、善恶之分。他们往往是根据自己的论辩需要而论证出任何一面问题的合理性。他们仅将辩证法作为一种赢得论辩的工具,而否定普遍性知识的存在。

苏格拉底不是使用辩证法的第一人,但他却是使用辩证法寻求真理的第一人。他以积极的目的将辩证法运用至自己的哲学思辨,他以自己母亲从事的“助产之术”来比喻他的辩证法。在与他人交谈的时候,苏格拉底首先会承认自己对某一事物的无知,将自己与对话者摆在一种平等的地位进行交流。他通过这种谦逊的态度引导对方接受自己的询问并表达出自己心中关于这一事物的看法,由此孕育出对于某一确定事物的认识。在交流中,苏格拉底针对对话者回答中所揭露

[1] 柏拉图. 柏拉图全集(第一卷)[M]. 王晓朝,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 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等. 希腊哲学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出的矛盾进行进一步的反问,通过列举相反事例来否定对话者的认识。在此过程中,苏格拉底诱导对话者做出新的认识。他通过如此反复的追问与反驳,不断引导谈话者归纳出关于这一事物的确定性特性,并对这一事物得出普遍性之定义。辩证法的最终目的是帮助对话者从自己内心产生出有关事物的真理性知识,而整个过程就犹如孕育一个全新的婴儿一般。

苏格拉底运用积极的理性分析与逻辑推导之术来帮助人们走向真理,同时也教人们承认自己的无知,从而虔诚地寻求真理。这种辩证法正是苏格拉底完成其哲学救世之利器。苏格拉底引导着城邦公民向善的追求,同时他这一方法得到了后人的继承与发展,对后世西方思想中辩证法体系的成熟与完善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苏格拉底的道德思想与政治理想

苏格拉底在历史上更多的是作为道德哲学家与道德之榜样为后人敬仰。在他整个思想体系中,道德哲学居于核心地位。他将哲学转向对人自身与人类德性的研究,主要目的在于以理性的辩证法探寻美德之普遍性定义。他以理性主义哲学观念作为探究道德思想的理论基础,并将道德哲学之要义延伸至政治、宗教等领域。他希望以此重建城邦公民的道德价值体系,矫正社会不正之风,从而实现建构理想社会。

1. 德性即知识

苏格拉底以理性主义的哲学观念为他理性主义的道德哲学思想开路。他以“认识你自己”为口号,倡导人们以理性为基础认识知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苏格拉底的思想体系内,所谓的知识就是他极力倡导的德性,因此,“认识你自己”就是认识一切德性。苏格拉底希望在此基础上指引公民追寻灵魂深处的善,帮助城邦恢复它本真的善。

“德性即知识”可以说是苏格拉底道德哲学思想中最为关键的命题。“德性”最初意指“任何事物的优点、长处和美好的本性”。苏格拉底将德性的内涵加以扩展,认为人在生活行为中表现的所有优秀美好的品质,诸如他常与人探讨的勇敢、正义、自制、智慧、友爱、虔敬等都是德性。德性所体现的内容都是高尚与美善的。而苏格拉底的“知识”即是通过“认识你自己”而得来的,即对于人自己本性的认识。这种知识同时也是对于人与整个世界的理性认识,是真理性的、善的知识。因此,苏格拉底将德性等同于知识,提出“德性即知识”的基本命题。

苏格拉底毕生的哲学实践也正是以这一命题为主旋律,他与人们展开的所有对话最终都引向对于“德性”的思考。无论是谈论“勇敢”、“友谊”、还是“自制”,最终都会将对话者转向对这些品质与德性之间关系的思考上。在苏格拉底看来,德性与道德人格是相统一的,正是勇敢、友爱、自制、正义与智慧的普遍性的本质构成了“德性”的内涵。它们是德性的组成部分,与德性密不可分,只有在整体的德性本质之下才能够去领会每个道德品质的本性。苏格拉底教诲人们认识“什么是勇敢”、“什么是自制”等而得出它们的普遍性定义,以确定性、规范性的知识来理解这些德性之具体表现。

苏格拉底进而认为人们的知识是经过理性思考而非仅通过感性认识得来的,因此德性即理性的知识。一个人如若没有理性知识,那么他就无法拥有德性。苏格拉底提出与“德性即知识”相对的“罪恶即无知”,相信一切人们之所以为恶完全是由于人们的无知,因此做出了错误的行为选择。但是他认为“无人自愿为恶”,因为苏格拉底坚信“趋善避恶”是人之本性。他坚信没有人会明知恶而为之,明知善而不为。恶带给人们的是痛苦,善带给人们快乐。没有人愿意承受恶

之痛苦而拒绝快乐,所以一个人作恶的原因只能是他不知道这样做会产生恶果,因此“罪恶即无知”。苏格拉底曾对知识之重要性做出过陈述“那些知道知识的人知道什么事对自己合适,能够分辨自己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而且由于做自己懂得的事情就得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从而繁荣昌盛;不做自己不懂得的事情就不至于犯错误,从而避免祸患。”^{[1] 436}知识如此之重要同样表明了德性的重要性,而这正是苏格拉底竭力追求智慧与德性的根本所在,不仅为公民谋求幸福与快乐,同样为城邦争取昌盛与繁荣。苏格拉底这种崇高追求恰恰体现了他毕生所追求的“善”。善是苏格拉底的思想体系中的灵魂,也是德性的最高本质。德性之全体即是善,“善是人类一切行为之目的,其他一切事情都是为了善而进行的”,“善也是全部生活的目的,治理城邦的目的就是要使城邦和公民尽可能地行善。”^{[2] 500}

在崇高道德理想的指引下,苏格拉底将一生都奉献于道德教育的伟大实践中。他以虔诚的言传身教孜孜不倦地教诲身边每一位公民去认识自己的德性,实践自己的德性。

2. 德性之可教

苏格拉底认为德性是人之本性,由神公平地赐予每一个人。但这种德性潜藏在人们内心,因此人人都有德性,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表现出德性。那些一直处于潜藏状态的德性只有经过理性认识的指引,才会慢慢复苏,继而外在表现出来。因此,德性的实践需要理性教育的指导,人类的知识是可教的,而“德性即知识”,因此德性也是可教的。

苏格拉底坚定地认为只有那些具有普遍性定义的知识才是可教的,而那些如智者学派推崇的没有绝对的价值标准的、主观相对性的意见是不可教的。德性是知识,因此德性是有着普遍价值、绝对共性的,是可以被人们明确认知的。它是人类理智的产物,是可以在人们的心中进行共同交流与感悟的。德性是可以在人们中间达成一致的观念认知与实践标准之认同,因此德性是可以透过教育实践活动而成为可能。

此外,苏格拉底还肯定了德性的整体性。他认为诸如勇敢、友爱、自制、正义与智慧等各种德性都是有机结合、具有共同本质特性的一个整体。它们之间虽然存在着特性上的差异,但苏格拉底认为“它们就像不同的小金块,本性上都是同质的金子,蕴涵着有机联系的同一性。苏格拉底认为正义而不自制、不虔敬,勇敢而不明智,既愚蠢又自制,既善又恶,都是不可能的。”^{[2] 502}因此,人的各种德性不是零散独立的,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性,它们是由理性构成的和谐统一的整体。

3. 知识论道德观

苏格拉底对于道德哲学思想的阐述是在批判智者学派相对主义的道德学说基础上完成的,他认为智者学派主张的情感论的道德学说为当时雅典城邦的堕落与混乱提供了某种理论依据。在苏格拉底看来,智者学派对人之情感的张扬忽视了知识的重要性,贬斥了人之理性,从而使得整个城邦陷入一种对相对性的情感论德性的狂热追捧。苏格拉底自觉承担力挽狂澜之使命,与智者学派据理力争,意欲将人们重新引向理性主义的道路。他以知识论的道德观抨击智者学派的情感论道德学说,提出“美德即知识”的口号为自己的道德观烙上理性标签。需要指出的是,苏格拉底的“知识论”是具有一定实践性质的,因此他的“德性”也是一个实践的概念,是达到“知

[1] 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等. 希腊哲学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2] 姚介厚. 西方哲学史(学术版·第二卷)[M].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行合一”的动态概念。

亚里士多德对于苏格拉底的道德哲学思想曾做过相关的评价。他一方面肯定苏格拉底对古希腊道德哲学所做的开创性贡献,在此基础之上也指出其观点之不足。亚里士多德认为苏格拉底“只研究德性是什么,而不探究美德是如何或从哪产生的”。他认为苏格拉底知识论的道德观将德性完全等同于知识,而不去探究德性的产生与实现。这就忽略了对事物的由“知”到“行”中间环节的考量,这是有缺陷的。此外,他指出苏格拉底“惯于使德性成为知识,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所有知识都涉及理性,而理性只是灵魂中的理智部分。在他看来所有的德性都在于灵魂的理性部分,他遗弃了灵魂的非理性部分,因而也就遗弃了情感和性格。”^{[1] 437-441}他认为苏格拉底将德性看作完全理性的产物是有失偏颇的,而这正是后来柏拉图所努力完善的内容。亚里士多德对于苏格拉底道德哲学的批判有一定意义。但是我们应该明确亚里士多德的批判观点,更多的是在柏拉图完善之后的道德理论背景下展开的,而苏格拉底当时所创立的宏观性的知识论道德实践哲学之重大历史意义是不容置疑的。

4. 道德兴邦与贤人治国

苏格拉底目睹城邦公民的道德堕落所带来的城邦衰败,见证了骄纵暴戾的统治者所造成的城邦战乱。他作为一位“牛虻”式的救世哲学家,对城邦的振兴倾注了全部的热情。尽管如此,他坚持聆听神谕指示不涉足政治制度之内,仅仅作为一名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的局外人为城邦的政治发展中的问题进行诊断,并开出药方。

苏格拉底将雅典城邦的衰败根源归因于道德堕落,这也是他痛斥智者学派的根本原因。苏格拉底认为,智者以诡辩论来帮助图谋不轨的野心政客获得政治权力,放纵他们攫取私利而不顾城邦之公益,最终使得城邦一片乌烟瘴气。与之相对,苏格拉底指出道德是政治统治的基础,若要实现城邦政治的振兴只能依靠道德重建。道德复兴之基础在于城邦公民个人的灵魂向善,践行勇敢、正义、节制、智慧之美德,指引公民追求真善之美,从而形成稳定和谐的社会政治秩序。

衰落时期的雅典政治制度历经几次变迁,在苏格拉底的有生之年雅典最终恢复了最初的民主制度。但是此时的民主制再也无法回到先前伯利克里时期的辉煌与兴盛。不断的政治制度变迁使得雅典城邦愈加衰弱,苏格拉底从批评城邦统治者角度来探寻城邦政治衰落的原因。苏格拉底认为治理城邦是一件伟大的事业,就像舵手、鞋匠、医生等都需要专门的知识一样,治理城邦这种大事更是需要由那些能够精通治国之术与政治技能的专门人才来完成。政治家并不是每一位普通的城邦公民都可以担当的,真正能够统治城邦的政治家不仅要掌握精湛的统治知识,最重要的还必须具有渊博的知识与良好的道德素养。只有这样才能够引导城邦公民灵魂向善。苏格拉底希望民主制度能够选贤任能,将明智向善的贤人推举到政治体制之中,在贤人的引领下实现城邦的振兴。

苏格拉底在哲学、道德、政治等领域外还涉足美学、宗教、语言学、逻辑学等领域问题的研究,而所有这些恢宏丰厚的思想都是从苏格拉底一生的哲学实践中得到体现的。苏格拉底是一个行动中的哲学家,他借“神之命令”支撑自己的哲学使命。他以苦行僧式的生活坚持不懈地在城邦内进行论辩与教诲,他后半生过着清贫拮据的生活,摒弃世俗的一切物质欲求,以灵魂与道德的至美充盈着自己的人生。

[1] 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等. 希腊哲学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四、苏格拉底之死

坚持用行动传道的苏格拉底，在雅典城邦中兢兢业业地奉行“牛虻”使命，然而选择做一只“牛虻”，必然就要承受“被拍打”的痛苦，甚至是死亡的厄运。年已古稀的苏格拉底，在公元前399年迎来他生命的终点，抑或是一个新的起点。

1. 对苏格拉底的审判

也许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控诉，三个雅典城邦的公民在这一天将城内最有智慧的苏格拉底告上了法庭。他们的起诉状里对苏格拉底是如此定罪的：“苏格拉底有罪，他腐蚀青年人的心灵，相信他自己发明的神灵，而不相信国家认可的诸神。”^[1]¹⁰年事已高的苏格拉底在此罪状的控诉之下，来到雅典的公民法庭，他的悲剧命运也在这一刻拉开序幕。

70岁的老苏格拉底生平第一次被请上公民法庭，他以一种愤慨但坦诚的态度展开了自己的第一次辩护。在法庭上，他并未直接针对原告的起诉做出辩白，而是首先向在座的雅典公民敞开心怀，直面自己在雅典的境遇。他将雅典人对自己的误解定为一种存在已久的非正式的指控：“苏格拉底犯有爱管闲事之罪，他对天上地下的事物进行考察，还能使较弱的论证击败较强的论证，并唆使其他人学他的样。”^[1]⁴苏格拉底清楚地知道，他对德尔菲神谕的虔诚验证是惹恼雅典人的根本所在。正如我们了解到的，他每天所做的事情就是向他认为有智慧的人请教，但结果往往是揭露了对方的无知而激怒对方，使他们产生对苏格拉底的敌意与怨恨。但是，苏格拉底丝毫不惧这些敌意与诽谤，依然坚定自己奉行使命的立场。之后，苏格拉底为针对他的正式起诉做了辩护，他痛恨这些将“莫须有”的罪名加之于其身的控诉者，悲哀于人们对他的误解，但他仍坚持用一贯的对话形式希望得到公正的审判。令人扼腕的是，苏格拉底最终被裁定有罪，并被判处死刑。而此时的苏格拉底却是大气凛然，不悲不惧，他意味深长地向雅典公民道别：“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但是无人知道谁的前程更幸福，只有神才知道。”^[1]³²一个月之后的苏格拉底在狱中从容饮下一杯毒芹汁，离开他献身终生的此岸。

2. 苏格拉底之死的思想史意义

苏格拉底的死对于当时的雅典公民来说，也许只是一个爱在街边唠叨的小老头消失了而已，甚至于对当时许多公民来说这是一件拍手称快的事。然而随着历史的前进与发展，苏格拉底之死却成了震撼历史的一场不可抹灭的悲剧，并以一种不朽的力量予世人以启思。苏格拉底犹如一位殉道士，以他的死向世人昭示着生命的超然与永恒。

太多的人对苏格拉底的死表示不解，他有太多不用去死的理由：首先起诉他所提出的三个罪状——亵渎雅典诸神、引进新神、蛊惑青年——对于苏格拉底来说完全是“莫须有”之罪名。即便真的定罪，他还是可以向法庭的审判员请求减轻罪行以逃过死劫，或者在进入监狱之后听从他朋友的劝告，接受他们的帮助而逃亡他乡。再者，他不能只顾及自己的尊严而丢弃对家庭子女的责任，不能不理睬朋友的感受而执意赴死。这一切对苏格拉底来说都是一种活下去的希望，但他为什么偏偏选择在人们看来满是绝望的死呢？对这一问题的解读，对后世思想产生重大影响。

苏格拉底之死首先被认为是一种为整体主义精神的殉道。在古希腊，正统思想认为，个体是因为分享了整体的一部分，从而获得价值与意义。苏格拉底所叹息的城邦堕落，很大程度上，是

[1] 柏拉图. 柏拉图全集（第一卷）[M]. 王晓朝，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